

(宋)朱熹 注



四书集注

王浩 整理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书集注/(宋)朱熹注;王浩整理. —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08. 11

ISBN 978-7-80729-200-5

I. 四… II. ①朱…②王… III. ①儒家②四书—注释
IV. B222. 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2011 号

- 书 名 四书集注
著 者 (宋)朱熹注 王浩整理
责任编辑 王华宝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发行部电话 025—83223462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 9 号 邮编 225008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2. 125
字 数 383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200-5
定 价 22. 00 元
(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前 言

彭 林

南宋光宗绍熙四年(1190),正在漳州任上的朱熹刊行了他编注的《四子书》,也就是后人所说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包括《大学章句》一卷、《中庸章句》一卷、《论语集注》十卷、《孟子集注》七卷。大概连朱熹本人也始料未及的是,这部文字浅近、篇幅并不浩繁的著作面世之后,势头甚至盖过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《五经》,成为此后七百多年中最具影响力的文献。

一、三教并立格局下的儒学隐忧

春秋末期,孔子首创私学,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教授弟子,从此,经书就成了儒家的经典。秦火之后,《乐》经失传,《六经》变成了《五经》。汉兴,《五经》被列入学官,每一经都有专门的教授,负责指导博士弟子。经学变成官学之后,借助于行政的力量,流传更为广泛,这似乎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。但是,进入官府之后的经学,性质和作用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

孔子将济世救民的理念渗透在《六经》中,希冀以此教化学生,推动社会进步,实现他的政治理想。可是,作为官学的经学并非完全如此。教师出于教学的需要,关心的是如何从文字、训诂的角度来说解这批古奥难懂的先秦文献。不少学者皓首穷经,用毕生的精力来注解经文,从学术层面来说,这固然是推进经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工作。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,这些原本充满人文精神的经书,已经慢慢

地淡出读书人的精神境界，变成了纯粹的学术问题，甚至成为读书人谋求功名利禄的工具。这不能不说是儒学的悲哀。

正当儒学成为学者高头讲章之时，佛教和道教悄然走进了中国人的凡俗世界。东汉以后，佛教开始传入中国，不久道教也开始兴起。唐、宋政府都将佛教、道教与儒学并立，作为基本国教。佛教和道教有玄妙而生动的心性理论，无论地位高下、文化深浅，都可以轻松进入它的堂奥。它们有彼岸世界，可以许诺实现信徒的种种愿望，解脱他们现世的诸多烦恼，走向极乐世界，所以很快风靡于世，从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，趋之若鹜。

相形见绌的是儒家，它除了没有佛道的上述优势之外，还有文献本身的诸多问题，处境最为窘迫。孔子整理的《六经》，都是用先秦的语汇体系撰写的，中古时代的学者读起来已经感到处处隔膜，不易亲近，一般学者初读，不容易触摸到明晰的脉络。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是先秦两位圣贤的言论汇编，由于是语录体，章节之间缺乏明快的衔接，也给人以吉光片羽，不成体系之感。这些正是它不能像佛道经典那样在世俗社会广泛传播、生存空间日益缩小的重要原因。

二、韩愈、李翱、二程对《大学》《中庸》的提倡

如何应对佛道两家的挑战，找出某些能够明快地彰显儒家思想体系的文献，是唐宋儒者最为迫切的任务。唐代学者韩愈和李翱最早注意到，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是足以与佛道心性理论相抗衡，并且能够梳理出儒家理论体系的最佳文献。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原本是《礼记》中的两篇。《礼记》是孔门七十子论礼的文集，共有四十九篇，作者多数不甚清楚。相传《大学》是曾子所作，《中庸》是子思所作。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为《礼记》作注时，并没有对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作特别的提示。《中庸》主要讲天道与人道关系，阐述天命与性的关系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中庸说》二篇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有戴颙《中庸传》二卷、梁武帝《中庸讲疏》一卷，似乎有个别人

做过单独的研究；《大学》在唐以前无单行本传世。凡此都表明它们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。

韩愈一方面写下了著名的《论佛骨表》，痛斥佛教的妄佞；另一方面，写下了著名的《原道》，提出了从尧舜禹汤、文武周公，传到孔孟的“道统”，以抗衡佛家的“法统”。指出佛道两家虽然也讲道德，但那是缺乏灵魂的空洞名词，这灵魂正是儒家道德学说中反复提倡的仁义。

李翱是唐代第一位比较集中地提出儒家心性理论的学者。李翱依据《中庸》作《复性书》三篇，指出《中庸》就是论性命之道之书，可叹“学者莫能明是”，所以都“入于庄列老释”求之。李翱说，性为“天之命”，情为“性之动”，性原本寂然不动，感物而起，流为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。人之所以不同于万物，是因为人有道德之性，人应该努力修德，恢复本善性，进于圣人之域。

在韩愈、李翱的影响下，构建儒家的心性学说和修身理论，成为宋儒孜孜以求的目标。宋儒表彰《中庸》者很多，从张载的《正蒙》、司马光的《大学广义》、王安石的《礼乐论》、程颢的《定性书》、程颐的《与吕大临论中书》等，都紧扣《中庸》来讨论性命之道。张载早年就留意《中庸》，其学“以《易》为宗，以《中庸》为体，以孔孟为法”（《宋史·张载传》），他的代表作《正蒙》，将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，提出了人的本性、心知、道德修养等性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。二程将《大学》作为“初学入德之门”；将《中庸》看作“孔门传授心法”之书，最为玄妙，认为“其书始言一理，中散为万事，末复合为一理”，“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”（《中庸章句》注引语）。“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，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，次言存养省察之要，终言圣神功化之极”（《中庸章句》注）。但是，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比较粗浅，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迅速在天下推行的程度。真正达到这一目标的是南宋的朱熹。

三、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

朱熹，字元晦、仲晦，号晦庵、晦翁，晚号遁翁，别号考亭、紫阳，又号云谷老人、沧州病叟。祖籍徽州婺源（今江西婺源）。高宗建炎四年（1130），生于福建南剑（今福建南平）尤溪。

朱熹出入经史，学术赅博，是南宋最著名的学者。可是朱熹的仕途相当坎坷，终其一生，历经高宗、孝宗、光宗、宁宗四朝，“仕于外者仅九考，立于朝者四十日”（黄干《行状》），仅仅在同安、南康、漳州等地做过九年的地方官；宁宗时虽然成为帝王之师，却只有短短的四十天。庆元元年（1195），韩侂胄党人攻击道学为“伪学”、指责朱熹是“伪学罪首”，朱熹因此而落职罢祠。这对于胸怀经天纬地之材、匡时救世之志的朱熹而言，实在是一种可悲而又无奈的现实。庆元六年（1200），朱熹溘然长逝。

朱熹平生主要是一位学者，他的主要精力是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。他与吕祖谦、陆九龄、陆九渊等的鹅湖之辩，是传颂千古的美谈；他兴复白鹿洞书院、讲道武夷精舍、修复岳麓书院等等，也是文化史上的佳话。不过，最为学者所称道的，还是他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

朱熹编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是把它作为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千锤百炼而成就的。

朱熹从三十岁时就措手于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到孝宗八年（1172）他四十三岁时，才完成了《论孟精义》（此书后名《论孟要义》，又改名《论孟集议》），可谓浸透了心血。此书将二程说解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文字“蒐辑条疏，以附本章之次”，又兼采张载、范氏、二吕氏、谢氏、游氏、杨氏、侯氏、尹氏等九家之说，以佐证二程之说。之后，朱熹以《论孟集议》为基础，“约其精粹、妙得本旨者”，提炼出《论语集注》和《孟子集注》，在每条之下先注音，次释字义，次释大旨，次引诸家论说，次列己见。朱熹对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的注解，旨在融会诸家之说，所以称为“集注”。淳熙四年（1177），朱熹将他取舍的原则，以及与学生的问答

编成《论语或问》、《孟子或问》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朱熹日后的主要精力放在了《论孟集注》的修改上，《论语或问》、《孟子或问》已无暇顾及，其中的问题也不复厘正，所以《论语或问》与《孟子或问》二书始终没有付梓刊行，仅仅在学者中私下流传。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都是朱熹幼年时代诵读、成年之后深思的经典，他在《中庸章句序》中说，《中庸》一书，自己“蚤岁即尝受读”，其后有过多年的“沉潜反复”，“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衷”，可见他的慎重。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，朱熹六十岁，感到所作《大学章句》和《中庸章句》已经比较成熟，“稳洽于心”，方才为之作序。

朱熹认为《大学》有阙遗之处，而且次序有颠倒错乱之处；《中庸》论述性理、天道，是圣人心中传的要诀，学理深奥，虽然没有残缺，但是章句浑沌，条理不清。因此，需要对二书的文本进行处理。文本的分节，没有照搬郑玄的成说，而是根据二程等学者的意见和自己的研究，重新调整了次序，分别章节，并作出了自己的解释，所以称为“章句”。他认为，《大学》开头的“大学之道”以下二百零五字是“经”，是曾子记述的孔子之言；后面的文字，杂引经传之说，略显散乱，但朱熹认为“文理接续，血脉贯通，深浅始终，至为精密”，当是曾子门人记述的曾子之意，其性质属于解经的“传”。《大学》的章次，二程认为有错简，为此重新作了编定。朱熹的编次，或从程本，或从旧本，间出己见。此外，他还依据上下文意和自己的理解，增写了“格物致知”章的一百三十四字。他认为，如此一来，就显得“序次有伦，义理通贯，似得其真”。《中庸》的文本也作了调整，分为三十三章。每条之下先注音，再释文义，然后引证申讲，发挥义理。经过朱熹的处理，二书神明焕然，面貌一新。

朱熹在《四书》的每篇之前，都有一篇序，提示该书的性质、由来，作者的生平与学行等，文字洗练，钩玄提要，非常方便读者。正文之前，又有一段简明的文字，介绍二程对此书的评价。《大学》每章之后，都有提示章节大旨的说明，如“右传之首章，释‘明明德’；”“右传之二章，释‘新民’；”“右传之三章，释‘止于至善’”等等，全篇之末，又

总结全篇结构,并叮嘱读者需要注意的事项:“凡传十章”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,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。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,第六章乃诚身之本,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,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。”

对《四书》的注释,朱熹一改汉儒的繁琐之风,务求简捷明快。汉儒重考证,宋儒重义理,彼此各为营垒。朱熹是宋儒中既重义理、又重考据的少数学者之一,他十分尊重汉儒,对郑玄等学者的学术成就评价很高,但是,他的《四书》注却没有汉儒诸经的生硬面孔,他在尽行吸收前人的考证之后,用近乎口语化的文字来表述,举重若轻,足见功力。注文尽可能使用常用字,对原文中较为偏僻或者有异读的文字,则尽量用直音法注音,帮助读者消除阅读上的困难。与宋代学者轻改经文的习气迥异的是,朱熹在变动文本的次序时,都会在章节之后加以说明,使读者了解原文在何处,以便案复,表现了朱熹对历史文献的尊重,以及他为学的严谨和慎重。

《四书集注》经过朱熹的覃思精研、反复修改,他说:“某《语孟集注》,添一字不得,减一字不得”,“如秤上称来无异,不高些,不低些。”直到临死前三天,他还在修改《大学·诚意章》。因此,称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精品佳作,《四书集注》是当之无愧的。

四、读《四书集注》要注意什么

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体大思精,宏纤毕贯,百般读之,犹不能尽其奥蕴。那么对于初读者来说,以下三点是需要留意的。

1. 读《四书》的次序。

儒家的经籍文献相当之浩繁,学者应该遵从怎样的次序去学习,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?二程早就谈及这一问题:“河南程夫子之教人,必先使之用力乎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之言,然后及乎《六经》。盖其难易、远近、大小之序,故如此而不可乱也。”(《书临漳所刊四子后》)。二程的这段论述对朱熹影响很大,他不仅主张《四书》是学习“《六经》之阶梯”,(《朱子语类》卷105)而且主张读《四书》

要有次序,但他提出的次序与二程略有差别:“某要人先读《大学》,以定其规模。次读《论语》,以立其根本。次读《孟子》,以观其发越。次读《中庸》,以求古人之微妙处。《大学》一篇,有等级次第,总作一处易晓,宜先看。《论语》却实,但言语散见,初看亦难。《孟子》有感激兴发人心处。《中庸》亦难读,看三书后,方宜读之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14)。这种阅读顺序,既是从《四书》的难易来考虑的,也是从《四书》之间的有机联系考虑的。

《大学》既有“规模之大”,又有“节目之详”,其中的三纲领(大学之道在明明德,在新民,在止于至善)、八条目(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),是讲学习目的、学习内容、学习步骤和最终的功效,是为学的“间架”和“修身治人底规模”。《论语》讲日常修德从政,《孟子》谈心论性,内容浩瀚广博,情理兼茂,正可以尽其蕴奥,充实《大学》的间架。《中庸》是谈玄说妙之书,讲“上达处多”,是形而上的学问,最后会归于此,可以“求古人之微妙处”,进入理论探讨的层面。“尺度权衡之既当,由是以穷诸经、订群史,以及百氏之书,则将无理之不可精,无事之不可处矣。”(《四书或问》李方子引朱熹语)

我们今天所见到的《四书集注》的本子,大多不是朱熹提出的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的顺序,而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,这是不明就里之人所为,违背了朱子的本意,殊不可取。

2. 读书与修身不可偏废。

我们读《论语》,可以看到孔子对修身的重视。孔子说:“修己以安人”,“修己以安百姓”(《宪问》),又说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,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”(《子路》),把修身当作治人的基础。孔子把修身进德看作是君子的日课:“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,闻义不能徙,不善不能改,是吾忧也。”(《述而》)

《大学》发展了孔子修身为本的思想,提出“正心”、“诚意”、“致知”、“格物”等修身方法,认为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,修身关系到治国平天下。《中庸》强调诚为修身之本,提出:“唯

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。”而要做到“诚”则又强调“反求诸其身”，提出“君子必慎其独”的自我修养的重要方法。

但是，后世儒者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经典，大多把它当作射取名利的工具，很少与修身相结合，因而人心浇薄，世道浸衰。朱熹主张体用合一，要求学生虚心涵泳，真实履践孔孟之道，他说：“《论语》之言，无所不包，而其所以示人者，莫非操存涵养之要。七篇之指，无所不究，而其所以示人者，类多体验充扩之多。”（《论语精义序》）又说：“圣人作经，以诏后世，将使读者诵其文，思其义，有以知事理之当然，见道义之全体，而身力行之，以入圣贤之域也”，“欲求道以入德者，舍此为无所用其心矣。”（《书临漳所刊四子后》）他在《论语序说》中引程子的话说：“今人不会读书。如读《论语》，未读时是此等人，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，便是不曾读。”可见，朱熹非常强调读书与做人是一致的，不能做成两张皮。朱熹的这一思想，至今依然是我们读《四书》时应该遵循的原则。

3. 建立了理学的理论体系。

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是朱熹学术思想的结晶，它的特点，是通过注释阐发理学的哲学世界观和心性学说，构建了以天理论为最高范畴的、包括天理论、人性论、格致论、道统论、教育论、政治论等在内的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，这是它与传统经注的不同之处。注文大多是朱熹自己所写，所引诸家之说，主要是二程及其门人的文章和语录，显现了极其浓郁的学派色彩。

朱熹继承韩愈以来的“道统”说，把伪古文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其中”十六字坐实为尧舜以来传授的“心法”。十六字中包含了“人心”、“道心”、“精”、“一”、“中”等最重要的哲学范畴，以此阐发《中庸》的“纲维”和“蕴奥”。他从理本论出发，认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，当气化成形体时，理也赋于其中，这就是性。人物各循其性的自然，日用之间皆有当行之路，这就是道。人类的性道虽然相同，但气禀有差异，所以有过或不及之差，圣人用礼、乐、刑、政来品节人性，使之复归于中正。人应该不断完善自我修

养，“以去夫外诱之私，而充其本然之善”。天理论的核心，是“理”或“天理”是宇宙的根本。在“性论”中，朱熹承继“天命之性”和“气质之性”的区分，并加以发挥，提出“道心”、“人心”等概念，从而将《中庸》理学化、本体化了。朱熹为《大学》补写的“格物致知”章，堪称程朱理学“格物致知”论的精髓。类似的例子在书中在在多有，读者可以仔细寻觅和体味。

五、《四书集注》的影响

《四书集注》是朱熹倾尽平生精力而作，所以学者给予很高评价，认为其学术成就远在他的《易本义》、《诗集传》之上。

赵顺孙说：“文公一生精力多在此书，一章之旨、一字之义，或数年更易而后定，或终夜思索而未安。”（《四书纂疏》自序）杨载说：“《四书》者，王道之骨髓，五经之根柢也。”（程复心《四书章句纂释》序）汪克宽：“《四书》者，六经之阶梯，东鲁圣师以及颜、曾、思、孟传心之要，舍是无以他求也。孟子没，圣经湮晦千五百年，迨濂洛诸儒先抽关发矇，以启不传之秘，而我紫阳子朱子且复集诸儒之大成，扩往圣之遗蕴，作为《集注章句》、《或问》，以惠后学，昭至理于皦白，盖皜皜乎不可商矣。”（倪士毅《四书辑释》序）刁包说：“尚论诸儒，必以《四书》为标准，《四书》无所得，虽经史淹贯，不可以为学也。”（蔡清《四书蒙引》序）王义山说：“晦翁《四书》与《六经》并行于天地间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前圣继绝业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此书也。”（周焱《四书衍义》）

学术界有许多名儒都将《四书集注》奉为圭臬，将诵读《四书集注》作为每天必修的日课，成为一时风气，如真德秀“每晨起坐堂上，炷香开卷，必点校一章，从而演说其义，子侄皆立侍焉”。宋明理学传入朝鲜后，《四书集注》风靡于世。在历史上，朝鲜是儒家化相当彻底的国度，但平心而论，朝鲜的儒学主要是朱子学，而朝鲜的朱子学主要是四书学。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韩国学术界。

《四书集注》中的许多词语，成为全社会最为熟知的名词，最典型的如“格物致知”一词。《四书集注》问世后，一时之间，许多学者开始将医学、数学、生物学等称为“格物致知学”，如朱震享的《格致余论》，曹昭的《格致要论》，胡文焕的《格致丛书》等。明清时代，中国学者普遍用格致学来称呼西学，如熊明遇的《格致草》，高一志的《空际格致》，汤若望的《坤輿格致》，陈元龙的《格致镜源》等书，都冠以“格致”的名目，就连牛顿的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最初的中译本也题名为《数理格致》。京师大学堂同文馆设“格物馆”，徐寿与傅兰雅在上海开设“格致书院”等，也都属于此类。乃至留日的章鸿钊、留英的丁文江在归国后被授予“格致科进士”。

《大学》的“三纲领”也作为传统教育思想的理念被广泛传播，例如，清华大学旧有的学生宿舍楼的“明斋”、“新斋”和“善斋”，就是依据“三纲领”来命名的，要求学生时刻铭记大学之道。类似的例子，不胜枚举，想必读者诸君都很熟悉。

元延祐年间恢复科举，鉴于《四书集注》文字浅近，说理深刻，加之在学术界得到的充分肯定，元仁宗皇庆二年（1313），政府决定将《四书集注》定为科举用书，明、清二朝承袭了这一制度，一直到清朝末年，《四书集注》都是天下学子必须首先诵读的经典，其影响之大、之深，可想而知。

不无遗憾的是，当《四书集注》成为科举用书之后，也进入了官学的行列，在某种意义上重蹈了汉代经学的老路，成为天下学子追求功名利禄的敲门砖，违背了朱熹的著作本义，这是朱熹所不曾想见、也不愿意见到的结局，其间的责任是不应该由朱熹来承担的。

整理说明

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，自汉武帝“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后，长期居于正统地位，体现儒家思想的经典，也就成为人们修身治世的思想准则和行为规范。“四书五经”为儒家经典的象征，是了解和研究儒家思想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著作。而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，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作之一，是宋代以来封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，其思想影响我国有数百年之久。可以认为，《四书集注》是人们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著作，也是我们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读物之一。

朱熹，字元晦，一字仲晦，号晦庵，又号晦翁，晚号遁翁，别称考亭、紫阳等。祖籍徽州婺源（今属江西），出生于南剑州尤溪（今属福建）。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（1130），卒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（1200）。绍兴十八年进士，官至焕章阁待制。去世数年后赐谥为“文”，世人尊称“朱文公”。朱熹是我国古代最博学的大学者之一，他在哲学、经学、教育、语言、文学、地理、考古、自然科学等方面均有重大贡献；朱熹又是我国古代继孔子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家、教育家之一，其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以“致广大、尽精微、综罗百代”（见清全祖望《宋元学案》）著称。他在理论上以孔孟之道为本，又继承并改造了两宋期间的主要流派，包括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等各家之说，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。

朱熹的思想学术内容丰富，这里不多介绍，只简要探讨一下其经学特色。尽管《四书集注》重视阐发义理，是以义理解经的代表作，但

朱熹也重视汉唐注疏。其注经方法如其在《论语训蒙口义》中所说：“本之注疏以通训诂，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，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，以发其精微。”自义理之学兴起，宋代学者多以为得孔孟不传之统，对汉儒注疏颇为鄙薄，而朱熹未受此局限。他在注解《四书》时，字斟句酌，反复修改，力求通达和洗练。而有意识地将训诂与义理结合起来，可以说是朱熹对中国经学的一大贡献。钱穆先生评价说：“朱子于经学，虽主以汉唐古注疏为主，亦采北宋诸儒，又采及理学家言，并又采及南宋与朱子同时之人。其意实欲融贯古今，汇纳群流，采撷英华，酿制新实。此其气魄之伟大，局度之宽宏，在儒学传统中，惟郑玄堪在伯仲之列。惟两人时代不同，朱子又后郑玄一千年，学术思想之递衍，积愈厚而变益新。朱子不仅欲创造出一番新经学，实欲发展出一番新理学。经学与理学相结合，又增之以百家文史之学。”（《朱子新学案》）这较好地揭示了朱熹注经的特点。

朱熹一生著述极为丰富，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儒家学者之一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，未著录者尚有二十余种，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。最重要、最有影响的，当推《四书集注》、《朱文公文集》、《朱子语类》、《朱子家礼》等。

朱子学说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宋代嘉定五年（1212），朱熹《四书集注》被列为国学必读教本；淳祐元年（1241），理宗下诏学官将朱熹从祀庙堂。元代至元元年（1335），惠宗下诏建朱熹文庙，次年封为齐国公。明代永乐十三年（1415），由成祖作序的《四书五经大全》颁行于天下，为科举取士的必读书；景泰、嘉靖二朝，朝廷推行祭朱制度，与祭孔相同，每年享春、秋二祀。清代康熙五十年（1712），下诏升朱熹配祀孔庙“十哲”之列，入大成殿立牌，康熙又命李光地等编撰《朱子全书》、《性理精义》，并亲自作序，颁行全国。朱熹学说，不仅成为中国的国学，而且自14世纪开始，就已相继传布于日本、朝鲜等国，日本从德川幕府时代起，就以朱熹学说为官学；朝鲜的朱子学更以四书学为主。如今，朱熹学说已为国际学者所重视，“朱子学”成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课题。

《四书集注》是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简称，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作之一，包括《大学章句》1卷、《中庸章句》1卷、《论语集注》10卷、《孟子集注》14卷（或分为7卷）。朱熹编撰《四书集注》，前后凡40年，直至去世前仍在修改，可见用力之深。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原是《礼记》中的篇章，至宋代时为理学家所重，被单独抽出。朱熹对二书加以注释，前加“序”，每章之后又进行总括。尤其是《大学》一书，朱熹以程颐的《改正大学》为底本，将《大学》分为“经”1章，“传”10章，重新编排了章节。为了阐释理学思想，还按照自己的观点编撰了一篇“格物传”补入《大学》中。朱熹对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注释以直抒己见为主，故称为《大学章句》和《中庸章句》。《大学章句》内容丰富，有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三纲领，有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八条目，是理学之伦理、政治、哲学的基本纲领，包含了理学的主要内容，所以朱熹认为《大学》是“初学入德之门”。《中庸》是“孔门传授心法”的重要著作，含有儒家相传的思想原则，“中庸”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，《中庸》所提出的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”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亦为朱熹所推重。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，占有很高的地位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二书，分别记述孔子、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行事，是反映孔、孟儒家思想的基本著作，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因为在注释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时，朱熹大量引用了程颢、程颐及他人的说法，所以二书以《集注》命名。

关于四书次序及读法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：“定著四书之名则自朱子始耳。原本首《大学》、次《论语》、次《孟子》、次《中庸》。书肆刊本以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篇页无多，并为一册，遂移《中庸》于《论语》前。明代科举命题，又以作者先后移《中庸》于《孟子》前。然非宏旨所关，不必定复其旧也。……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于《四书》。其剖析疑似、辨别毫釐，实远在《易本义》、《诗集传》上，读其书者要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。”可以参考。

《四书集注》体现了朱熹的“道统”观。朱熹继承二程的观点，非

常尊崇《孟子》和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以此三者与已成为经典的《论语》并列。他在《大学章句》中推论说，《大学》中“经”是“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”，而10章“传”是“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”；在《中庸章句》中认为，《中庸》是“孔门传授心法，子思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笔之于书，以授孟子”。朱熹认为，儒家之道由孔子创立，再经曾参、子思传至孟子，形成儒家道统。而其后道统中断了。直至宋代，才出现程氏两夫子程颢、程颐“有以接乎孟氏之传”，再加上朱熹本人，道统才得以继续。这样就将程朱理学与儒家经典紧密联系起来，从而抬高了程朱理学的地位。《宋史》卷427“道学”传序称：“迄宋南渡，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，其学加亲切焉。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，明善诚身为要，凡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之文，与夫孔、孟之遗言，颠错于秦火，支离于汉儒，幽沉于魏、晋、六朝者，至是皆焕然而大明，秩然而各得其所。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，而上接孟氏者欤。其于世代之污隆，气化之荣悴，有所关系也甚大。”由此可见，《四书集注》在中国理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《四书集注》于朱熹在世时曾多次修改，其最早刻本、最后定本现在均不可见，后世翻刻本不计其数。清嘉庆十六年(1811)所出吴县吴英、吴志忠父子刊印本，以多种古本和宋元人所作注释本相校，是现存较好的校订本。中华书局曾以此为底本出版过繁体竖排本。本书以吴氏校订本为底本，加以整理。全书简体字横排。经文部分，依照原书先后次序按章节单独排列，《论语集注》和《孟子集注》的每章节前加上序号；朱熹的双行注解，按其在文中出现的位置分别编出对应的数码，排在该章节正文之后。《论语集注》和《孟子集注》原分卷次，因无实际意义，今皆删去。清康熙时内府仿宋刻大字本《论语序说》后有《读论语孟子法》一文，全系引用二程之说，可以参考；底本原附吴志忠《四书章句附考》四卷、吴英《四书家塾读本句读》一卷，因参考价值不大，均予以删去，而吴英《附考序》及《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》二文，对《四书集注》版本的论述等可以参考，予以保留。书中的讹衍